

文化冷战 与中央情报局

原著【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翻译 曹大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文化冷战 与中央情报局

原著 【英】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翻译 曹太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英]桑德斯著;曹大鹏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2
ISBN 7-80173-028-3

I. 史… II. ①桑…②曹… III. 中央情报局(美国)-史料-1950~1967 IV.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410 号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原 著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翻 译 曹大鹏
责任编辑 王逸明
封面设计 无极艺术设计公司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振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18.25 印张 4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028-3/K·005
定 价 3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 icpc@95777.com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其实也可视为美国文化冷战史，因其所描述的时间跨度起自二战结束直至苏联解体，史料丰富翔实，从正文后所附的注释和资料来源即可见一斑。作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文献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她从开始研究到成书，历时七八年，辗转各地，查阅大量资料，遍访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可见其态度之认真。由一个外国人来写美国，大概较少偏见与局限，犹如法国人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和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之《美国政体》(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此书似尚无中译本)，反倒被世人视为研究美国的经典读物，本书从总体上说也较为客观、理性，观察敏锐而细致，可信度也较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主要是西欧，也包括美国)的知识界普遍减少了对苏联的偏见，思想上明显左倾，共产党力量壮大，甚至盛传意大利共产党可能执政。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向西“扩张”，抵制共产主义对西方的影响，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这已是大家都熟知的史实。不过，一般的论述都偏重于政治、军事领域，较少涉及文化艺术领域，而本书恰恰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领域。通过作者的详尽论述，读者会看到美国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论述，读者不难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对立

和冲突确实根深蒂固,并可以进一步认清当今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和政客仍摆脱不掉冷战思维的本质。

尽管从总体上说,本书还算客观,但作者毕竟是西方人,在书中援引事件、资料和进行评论时显然还是出自西方人的立场和观点,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我们不必苛求于作者的。相信我国读者自能分辨,毋庸编者赘言。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加工,力求译文的完整、准确,但仍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志 谢

本书的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总是带着我的累赘而又不起眼的行李——一大堆破烂纸箱四处奔波。我能够带回整整一个商队的战利品，都是因为有许多好心人帮助我，他们接待了我，为我提供资料，还让我不受干扰地工作。为此，我要感谢伊丽莎白·卡特赖特－希格尼特（Elizabeth Cartwright-Hignett）、弗兰克·达贝尔（Frank Dabell）、尼克·休尔（Nick Hewer）、厄萨·基特（Eartha Kitt）、赫缪恩·拉布隆－约翰逊（Hermione Labron-Johnson）、克劳迪娅和马塞洛·萨洛姆（Claudia and Mareello Salom）。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Ann Pasternak-Slater）和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不断地鼓励我，增强我的信心，对他们，我怀有特殊的感激之情。通过他们，我得以在纽约会见了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他既博学又热情，我对他也是深怀感激。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不吝为我那不够严谨的初稿修改润色，从而使之顺利地获得通过。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卡门·考利尔（Carmen Callil）的支持时虽然写作已进入后期，但那时我信心不足，正是他的支持启发了我，帮助我找回了已丧失的信心。杰伊·韦斯伯格对我的帮助无可估量，我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在他面前，无论在学术水平上还是知识面的广博上，我都自愧弗如。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成为此书合伙人们与我一道分担了种种艰辛，他们都承受了，而且还不失幽默。他们是我这本书的编辑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我的代

理人费利西蒂·罗宾斯坦 (Felicity Robinstein)、格兰塔图书公司 (Granta Books) 的全体工作人员、装帧编辑新出版社 (New Press) 的杰里米·巴格勒 (Jeremy Bugler)、托尼·卡什 (Tony Cash)、托尼·卡鲁 (Tony Carew)、劳伦斯·西马诺维茨 (Lawrence Simanowitz) 和安德烈·希夫林 (André Schiffrin)、贝尔多克, 莱文和霍夫曼公司 (Beldock, Levine & Hoffman) 的梅尔文·伍尔夫 (Melvin Wulf)。我还要为麦当娜·本杰明 (Madonna Benjamin)、佐薇·赫勒 (Zoë Heller)、康拉德·罗伯 (Conrad Roeber)、多米蒂拉·鲁弗 (Domitilla Ruffo)、罗杰·索纳姆 (Roger Thorham) 和迈克尔·怀里德 (Michael Wylde) 的友谊和耐心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朱莉娅·斯托纳 (Julia Stonor) 和我的兄弟亚历山大·斯托纳·桑德斯 (Alexander Stonor Saunders), 那么我写作以外的生活就走入绝境了。对于他们给予我的鼓励, 充满爱心的支持, 始终不渝地为我鼓劲, 在此, 我虽然不免感到羞愧, 我还是要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并将此书献给他们。

我开始研究文化冷战时, 原指望能够大大受益于美国的新闻自由法。根据此法, 原来许多政府密级文件解密向研究者开放, 其结果之一就是对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最初请求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是在 1992 年, 我的请求至今尚未得到答复。后来我又提出申请, 这次总算接受了, 但是又提醒我, 为我提供档案资料的全部费用大约是 3 万美元, 紧接着, 中央情报局的信息与保密协调员又告诉我, 我的申请付诸实施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不过我也不必为此发愁。英国的历史学家把美国的新闻自由法吹得天花乱坠, 但是他们要想在这个领域里获得研究资料还要经受巨大的挑战。总之, 就中央情报局而言, 申请的遭遇是悲惨的。好在私人收藏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 足以弥补这一缺

憾。从历史上看，美国历届行政当局一直是扩展到各种私有部门的，冷战时期则尤其如此，当时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既有政府各部门，也有某些混杂的临时联合组织，还有一些半官方的人物和机构。正是由于这种巴尔干化*（即使涉及秘密或隐蔽行动也不例外）使我有可能详尽地查阅有关各种行动的资料。对于那些有意在大海里捞鱼的人来说，美国全国各地的档案馆收藏的私人文件就是一个可供捕鱼的辽阔海洋。

任何依赖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工作，都需要许多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他们凭着专门知识，引导着研究人员走进其浩瀚的收藏之中，然后又领他们走出来。这些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无数的搁架，上面堆着的就是历史。这里我要立刻补充一句：如果在资料的组织和结构中有什么疏漏和缺陷，责任都在作者。对这种帮助和建议，我要感谢以下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纽约的塔米蒙特（Tamiment）图书馆、芝加哥的约瑟夫·里根斯坦（Joseph Regenstein）图书馆、阿比林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Butler）图书馆、华盛顿的乔治·米尼中心（George Meany Center）、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哈里·兰塞姆（Harry Ransom）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波士顿的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和独立城（Independence）的哈里·林鲁门图书馆。我还要向伦敦的公共档案馆、里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档案员们致以谢忱。

许多人为这本书都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对我不断的访问、电话、传真和信件都表现出善解人意的耐心。所有接受采访者的名字都列入了书后的“注释和资料来源”部分，在此，我谨向他们

* 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指一个整体分裂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团体，有“割据”之意。译注。

表示感谢。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戴安娜·乔斯尔森 (Diana Josselson)，她不吝为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她那令人叹服的记忆力，她坚定不移的支持（其中当然也不乏批评）和她私人收藏的照片都使本书作者从中获益良多。

前言

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

理查德·克罗斯曼

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执行一次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其目的就是“无中生有”。这项计划是美国的情报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执行这项计划的主体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自 1950 至 1967 年，负责人是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克尔·乔斯尔森（Michael Josselson）。该计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持续时间也不可谓不长。在最辉煌的时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 35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用员工数十人，出版 20 多种名声颇大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拥有一家提供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服务公司，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和画家颁奖，为他们提供公演和展览的机会，以此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中央情报局于 1947 年成立，就立即开始从极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中广泛网罗人员，组成一支由各类人物构成的混合部队，其中包括情报人员、政治战略家、大公司和常春藤联盟* 各

* 常春藤联盟（the Ivy League），指美国东北部一批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 8 所高等院校。译注。

大学的校友,他们身负双重任务,既为世界注射防疫针,以防感染共产主义,同时又为美国外交政策在海外获得利益铺平道路。结果是结成一张高度严密的大网,网络中的成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为推行其理念并肩战斗。这个理念就是世界需要美国和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可称为“美国世纪”。

中央情报局建立的这支队伍,按亨利·基辛格的说法,是“一个为国家效忠的贵族阶层,遵循的是超党派原则”。这支队伍是美国进行冷战的秘密武器,广泛地散布在文化领域之中。在战后的欧洲,作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评论家,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知情不知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与这一隐蔽事业有着某种联系。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种做法在 20 年中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人们也不知其内情,大家都认为这是为西方做好事。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

这支队伍由各色人等构成,其中有一批原来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但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粉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批人是从 30 年代“粉红色的十年”^{*}走过来的。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哀叹称这是一场流产的精神革命;一次毫无结果的文艺复兴;一种虚幻的历史曙光。这种幻灭感使他们获得一种新的共识,一种对新秩序的肯定,并以此来取代以往那种日渐衰落的力量。持不同政见的激进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他们一直是以破解神话、质疑已形成制度的特权和打破掌权者的自

* “粉红色的十年”(The Pink Decade),指 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左倾。“粉红色”有左倾政治观点的意思,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也可译为“左倾的十年”。译注。

鸣得意为己任的。但是这种传统已经中断了。这种状况对于拥护美国的观点自然是有利的。这个非共产主义的群体受到强大机构的钟爱,在其金钱的支持下,就像几年前的共产主义那样,这群人(其实,其中许多人是同一批人)已经形成一种卡特尔*式的西方知识分子联合体了。

查利·西特林(Charlie Citrine)是索尔·贝洛** (Saul Bellow)的《洪堡的礼物》中讲故事的人物。书中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有那么一个时期,生活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但生活又必须调节,于是知识分子就以此为任。比如说,从马基雅维利时代起,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一调节生活的工程总是那样宏伟壮观,同时却又可望而不可及,而且这还是一项带有误导性和灾难性的工程。像洪堡这样一个人,满怀雄心壮志,为人既精明又疯狂,他因发现人类工程竟如此宏大并变幻莫测而感到兴奋不已。他发现这样一项伟大事业必须交给拔萃的人物来承担,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有资格掌握大权的人选。是啊,这有什么不对呢?”^②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无数的洪堡式人物。他们一度被共产主义这个虚假的偶像所出卖。现在他们终于发现有可能建立一个新魏玛***,一个美国式的魏玛。

现在,这批左翼人物应当由中央情报局把他们集合起来,从事他们原有的事业,看来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批人受雇于中央

* 卡特尔(cartel),同业联盟,原意为同业的企业联合经营以避免相互竞争。译注。

** 贝洛生于1915年,美国小说家,是美籍犹太作家的代表。这里所举的《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出版于1975年,翌年获普利策奖。作品的主人公,同贝洛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犹太知识分子,才华横溢而又幼稚可笑,在他们身上既有远见卓识,又荒谬绝伦。译注。

*** 魏玛(Weimar),此处应指1918—1919年革命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1919年2月,共和国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根据新宪法建立的政府被认为是民主政府的象征。译注。

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有着真正的共同利益和信念,即使此时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明底细,他们也已经加入了冷战行列。美国杰出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写道:“中央情报局这股势力并不总是或通常是反动的、邪恶的。”^③“根据我的亲身体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在政治上是开明的,也是十分老练成熟的。”^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栖身之所。仅仅出于这种观点就足以诱使一些人同它合作,至少对于这个机构怀有良好动机的神话是默认的。但是同时中央情报局又被视为美国进行冷战的工具,一个对他国进行无情干预、行为极不负责任的工具。这种坏名声与上述观点是很不协调的。1953年推翻伊朗总理莫萨德(Mossadegh);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的阿本兹(Arbenz)政府;1961年灾难性的猪湾事件和1961年在越南执行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这一切都是这个机构在幕后策划的。同是这个机构,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进行监控;在国外对其他国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进行骚扰,策划暗杀行动;在国会里矢口否认进行过这类活动,而且在不断抵赖的过程中使其撒谎的技巧越来越高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既然如此,那么中央情报局通过什么高明的手段,竟然使亚瑟·施莱辛格这样思想境界颇高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它是一艘满载他们所钟爱的自由主义的金船呢?

美国间谍机构的触角触及的范围极广,伸展到了西方盟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之中。虽然从不承认,但实际上它是在支持范围广泛的创造性活动,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当成一盘棋赛中的棋子摆放在棋盘上的各个位置,这已成为冷战中最具争议性的传统手法之一。那个时期维护这一传统的人辩解称,中央情报局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其中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认真地追究是否属实。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界,总有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关切的确实只是扩大文化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只不过是支持人们把原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而已。”“空白支票”论者就是

这样辩解的。这种论点接着还说,如果从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中受益的人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因为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而有所改变,那么他们作为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其独立性就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但是,有关冷战的官方文件却系统地否定了这种利他主义的神话。凡是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的个人和机构,都被要求成为这场范围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宣传运动中的一分子。在这里,“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⑤均可称为宣传工作。这种努力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战”。这里,“心理战”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或‘非战’的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求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是有助于国家达到其既定目标,”均可称为心理战。进一步又为“最有效的宣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⑥这些定义在政府文件中随处可见,白纸黑字,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美国战后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论。

显然,中央情报局将其投入的资金加以伪装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直言不讳,那么他们的甜言蜜语和慷慨解囊就可能遭到拒绝。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做法又能带来什么样的自由呢?在苏联的议事日程上,肯定没有列入任何形式的自由这一项。在苏联,那些被送入集中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像牛马一般被套上笼头,强迫他们为政权的利益服务。反对这种不自由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如果认为战后的欧洲依靠自身内部的某种机制就能够复兴西方的民主原则,这种假设站得住吗?或者认为只要称颂美国的自由主义就能够实行民主,难道民主就如此简单易行吗?在思想的有机发展、自由争论和自由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外来的秘密干预?在他国秘密干

预下,那个国家的人民以为他们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实际上他们却是受到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这样做是否有以假民主充当真民主的危险?

中央情报局介入文化界又引出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接受经济上的援助会不会使知识分子提出自己观点的过程遭到扭曲?在选择哪些人可以受益时,是不是仅仅考虑他们所持的立场而置他们在学术上的优秀素质于不顾?亚瑟·凯斯特勒把知识界的会议和研讨会讥讽为“国际学术界应召女郎的电话召唤网络”,他的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一个人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文化队伍中的一员是否能保住并提高他的声誉呢?在国际上拥有读者,其实只是一些二流角色,只是一些昙花一现的宣传家,他们的作品只配堆在书店的地下室里,这样的作家和思想家究竟有多少?

1966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秘密行动。由于在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许多策划政变和政治暗杀(大部分因为手段笨拙而声名狼藉)的故事,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就成了一头闯进国际政治这片矮小树丛的离群野象,任何责任感都挡不住这头野象横冲直撞,在这些揭露“匕首加大氅”^{*}的惊险故事中,也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如何依靠西方文化界的婆罗门^{**},借他们的光从而使其行动也带有一些文化色彩。

有这样的说法,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尚有活力,这都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所赐,并不是源于他们自身的独立性。这种说法引起了普遍的反感。知识界在冷战高潮时期享有的精神权威现已丧失殆

* 匕首加大氅(cloak-and-dagger),故事或电影中的间谍形象,用来指诸如暗杀之类的隐蔽阴谋和间谍活动。译注。

** 婆罗门(brahmins),印度社会姓氏制度中的最高阶层。印度将社会人口分为五个等级,婆罗门最高,如僧侣,最低为“不可接触的贱民”(the untouchable)。译注。

尽,而且还常受人揶揄。原来的那种“舆论一致性”正在分崩离析,其核心部分也难以幸存了。由于知识阶层的分化瓦解,有关这个阶层的议论也就莫衷一是、偏颇并不断改调换辙,有时竟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都是因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势力为了自身的目的故意歪曲真实情况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导致事情败露的原因是意味深长而意义重大的,但是当时的环境现在却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了。由于美国过于热衷于投入它在越南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推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接着又发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外泄和水门事件丑闻,与此相比,对于文化方面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兴头十足还是义愤填膺,此时都已相形见绌了。

阿奇巴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写道:“历史就像一座建造得不好的音乐厅,里面总有一些听不清音乐的死角。”^⑦本书就是打算把这些死角记录下来,通过这本书找到一些不同于官方音乐大师们演奏的曲调。这是一部秘而不宣的历史,这部历史信奉的是个人间关系的力量、“软性”联系和勾结、沙龙外交和闺房政治的重要性。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历史就是“官方杜撰出来的故事,据说任何历史都是无数利害相关的方面一致同意的,而每个有关方面都煞费苦心来为自己建造让人产生误解的金字塔和纪念碑,以得出不真实的结论。”任何历史,只要是对那些“一致同意的事实”提出质疑,用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说,那就一定会被认为是某种亵渎行为。不过这样的历史倒是不会助长个人崇拜和圣贤崇拜,因为它力图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历史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破除世界上的幻想”是一致的;它恰恰同偶像崇拜相对立而存在。这样的历史是为了求实而重新对真实性加以评估,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那些目前尚被人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形象重现其光彩。



作者简介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生活在伦敦，198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经以独立制片人身份拍摄了纪录片《无形的手：关于现代主义的另一部历史》(Hidden Hands: A Different History of Modernism)。199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重大事件》。

